

管学素描

——在管子学研究的道路上——

牛力达 著



二〇〇一年八月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

目 录

序言	1
齐学三题——为《管子学刊》创刊十周年作	2
一、齐学的历史命运——读《临淄县志》	2
二、从帛书《易经》与今本比较研究看儒、道两家思想对 易学的影响	4
三、齐文化的现代意义	7
管子学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0
再论管子学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5
管子学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18
管仲思想初探 ——《国语》、《左传》与《管子》比较研究	23
《管子》成书年代之我见	28
附：《管子》成书年代诸说概述	33
《管子》书各篇断代琐谈	38
关于《牧民》、《形势》的断代	43
《轻重》诸篇探原	47
附：马非百先生来信	58
《侈靡》篇再研究	60

读《禁藏》篇

——兼评石一参对侈靡篇的篡改····· 90

《问》篇初探

——两千年前的一份社会经济调查提纲····· 96

读《八观》有感 ····· 100

关于《内业》若干基本概念的讨论 ····· 104

《心术》、《白心》琐谈····· 111

“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怎么讲? (通信) ····· 114

管仲其人、《管子》其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116

《管子》与《易经》关系初探 ····· 121

《管子》与法家的联系与区别 ····· 128

朱熹、李贽与管仲····· 135

《管子》与齐文化 ····· 140

补白六则····· 17, 22, 37, 110, 113, 115

重编后记 ····· 142

序 言

《管子》书号称难读。我自己有许多还没有读懂。没有读懂,就写文章,出书,似乎有点狂妄。实在是不得已也已!

我的钻研《管子》,是受郭老(沫若)著作的影响。先是《宋钐尹文遗著考》,后是《侈靡篇》的研究。《管子集校》获益尤多。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益发展,深感《管子》书经济学说,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然而,在学术界《管子》书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冷门:研究者寥寥。《管子集校》在一般图书馆也很难找到。于是,我想大声疾呼了。后年是《管子集校》出版三十周年,我希望在这前后,能够掀起一个管子学研究的高潮。

我的钻研《管子》是从参与胡寄窗、马非百两位老先生关于《管子·轻重》成书年代的争论开始的。《管子》书非一人一时之作,这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然而,不少学者虽然也赞成这一结论,但在分析《管子》的内容时,常常把它当作一个时间的作品(例如战国,或西汉)。这是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胡家聪同志说,《管子》研究“关键在断代”,这话说的很对。逐篇地进行研究,应该成为管子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书名“在管子学研究的道路上”,表示我们应该继承前人文化遗产,把前人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更具体地又表示我自己目前正走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多远,还很难说。这书名字数太多,于读者有所不便。因此,又叫“管学素描”。管学是仿“红学”(《红楼梦》)“钱学”(钱钟书)“金学”(金庸武侠小说)之意;素描乃借用画家语汇,意在它还是朴素的,很不成熟的。如果这个小册子能引起更多人对《管子》书的注意,那末,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月

齐学三题

——为《管子学刊》创刊十周年而作

一、齐学的历史命运

——读《临淄县志》

司马光留下一篇《稷下赋》，对战国稷下学宫的盛况，有生动的描述。特别是写了荀卿与齐王的对话，也颇得体。惟其中提到“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满其屋”。这不是荀况的观点。而是从孟轲到韩愈、到二程、到朱熹一派人的观点。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这一派人的观点，表述得最清楚不过了。中国哲学史上所谓“义利之辩”，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分歧。荀卿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齐学的，他曾在稷下“三为祭酒”。司马光对荀卿思想的窜改，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斗争。

比司马光稍前一点，北宋初期有个叫“贾同”的人，写了一篇《责荀文》。指责《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思孟轲为“是尧而非舜”，同样是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斗争。

明代的高启有一首诗《咏晏子》：

一裘身着久经年，禄米分炊几户烟。

尽说大夫能养士，却於尼父惜封田。

看来，这位高先生和写《孔子演义》的丁寅生先生同样抱着尊孔抑晏的观点，不了解晏婴与孔丘的斗争，实际上是齐学对鲁学的斗争。

从齐学自身发展来看，晏婴的“俭”纠正了管仲的“侈”。晏婴之“二桃杀三

士”未尝不是接受了管仲容忍、姑息，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的教训，从而发展丰富了齐学的内容。

从春秋到战国，到汉初，齐学始终占着优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鲁学即儒学占了统治的地位。这个统治整整延续了两千年。司马光、贾诩以及高启、丁寅生等一类的文字，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齐学是不是被打倒、被消灭了呢？没有。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符秦时代的王猛，都曾经以管仲自比。刘备临死的时候叮嘱他的儿子刘禅，好好学习诸葛亮手抄的《管子》等书。轻重理论曾经受到了历代著名理财家的高度重视和采用。不仅如此，清初有个陕西临潼人叫“杨端本”的，从康熙元年到九年，连任临淄知县达八年之久。在任期间，重视农田水利，关心群众生活，政绩卓著。当他去职时，有个叫做“刘祚远”的御史，写了“杨公去思碑”文，称颂说：“愚谷之麓兮白石齿齿，牧马山高兮丰碑帮帮，公之甘棠不没兮仲父其匹。”由此可见，尽管在官方正统的儒家经典中鲁学排斥了齐学，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齐学仍然在发挥它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两次，一次是二十年代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七十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然而，孔家店并未打倒。由孔夫子开创的好思想，好传统，当然是打不倒的。儒学思想的消极方面对经济问题和物质利益的卑视之类，也不是用打棍子、扣帽子的粗暴办法所能肃清的。齐学重视革新，重视物质利益和经济问题的优良传统，恰恰弥补了鲁学的缺陷。振兴齐学，发扬齐学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实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需要。

二、从帛书易经与今本比较研究看 儒道两家对《易经》的思想影响 ——兼探齐学之秘

在王赣同志主编的《古易新编》中，宣布过一个初步结论：现在通行的《周易》本子，包括上、下经和“十翼”，编定、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田齐稷下学宫。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与现行本有很多不同。近年来，我对《周易》的这两个版本做了比较研究，结论是帛书《周易》在前，帛书《周易》有很大可能是西周初年以姬昌、旦父子为首的西周统治集团编写的原本。经过数百年的演变，以它为基础，修订形成现在通行的《易经》本子。关于这个问题，我另有专文讨论。这里，只举两个卦例，说明道家思想对它的影响。

第一，今本《易经》的豚卦，帛书作“掾”。

豚，同遁。序、彖二传均释遁为退。历来多数注家均解为退避，或退隐之意。爻辞：“遁尾”，是说退的迟了。“系遁”，是说被迫退隐，有点拖泥带水。“好遁”，爱好退隐。“嘉遁”，更好一些，自觉地退隐。“肥遁”，宽裕自得的退隐，在旧社会这只有有钱、有势的人才能做到。总之，遁卦表现的是和尚、道士一类的出世思想。

掾。《说文》：“掾，缘也。”段注：“掾者缘其边际而陈缘也。陈缘，犹经营也。”秦汉属官称掾，盖取帮助之意。爻辞：“掾尾”，帮助的迟了，如雨后送伞。“系遯”，帛书作“为掾”，意谓维持帮助。“好掾”，喜欢帮助别人。“嘉掾”，赞扬表彰助人为乐的精神。“肥掾”，大量地慷慨助人。总之，与遁卦宗旨完全相反，完全是积极有为的人世思想。

今本《易经》改“掾”为“遯”，是道家思想渗入《易经》的反映。汉代以后，《易经》与《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并列为道家三玄之一，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今本《易经》履卦，帛书作“礼”。帛书卦辞：“礼，虎尾不真，人亨。”据邓球柏注：礼神用仿制的假虎尾巴，是古代虎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见《白话帛书周易》9—11页）

爻辞：初九，素履。帛书作“错礼”。错假错为措，为贯彻周礼而采取的措施。九二：“礼道稟稟”。稟，音单，信也，诚也。礼之道，必敬必诚。九五：“决礼贞厉”。决者决也。破坏了礼制是要遭到报应的。上九：“视礼”。巡视、考察周礼贯彻情况。我们知道，孔老夫子是很重视周礼的。后来儒家荀卿一派更以“隆礼”著称。他们决不会修改礼卦，改“礼”为“履”。履的本义，是指人们脚上穿的鞋子，引伸为“践履”。修改后的今本爻辞三次讲到“履虎尾”，反映了三种踏了老虎尾巴的不同情况和结果。加上“素履”、“夬履”、“视履”和“履道坦坦”，总结了人们在生活斗争实践中各种经验体会，较之“礼卦”，内容丰富，提高了很多，但“周礼”的影子一点也不见了。不能不说是道家一派反对周礼的思想表现。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再赘述。

儒家对《周易》的思想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彖传》中。众所周知。元，亨，利，贞，是《周易》经文的四个基本概念。《文言传》作为乾之四德，亦即易之四德，讲的很清楚。卦辞集中讲元、亨、利、贞的，有乾、屯、随、临、无妄、革六个卦。分散单提，或二、三字连提者，比比皆是。《周易》经文中有元字二十六个，亨字四十一个，利字一百一十三个，贞字一百零六个。利贞二字连成一词者二十二处，占六十四卦的三分之一，加上“利……贞”之数达三十五处，占卦数的半数以上。然而，在阐释卦旨的《彖传》中却讳言这个“利”字。卦辞集中讲元亨利贞的六个卦，除乾象只简单地作为贞的附加词出现外，屯、随两卦不见“利”字。临、无妄、革三卦甚至偷换了概念：临象说：“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象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革象则曰：“大亨以正，革而当。”这是为什么呢？查《孟子》一书明白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

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自有仁义而已矣!’……”孔门后学以孟轲为代表的一派是讳言财利的。我以为《彖传》的写作,应当是出于孟轲一派的儒家之手。

总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形势,应该说《周易》的思想是诸子百家思想之源。早在春秋时期,出现了分别以李耳和孔丘为代表的,形成贵柔和崇刚的两个易学流派。《道德经》和《系辞传》分别是这两派的代表性著作。道家 and 儒家都接受了《周易》的阴阳学说,也都把自己学派的观点,影响渗入易学。战国诸子莫不如此。管仲的时代早于李、孔,他的易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其称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由此可以看出,管仲对《易经》中包含的原始辩证法思想是心领神会,并贯彻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管仲所倡导的轻重理论:轻为阳,重为阴。轻与重,既对立又统一,是《易经》自然观——阴阳学说在经济、政治诸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重要发展。在《易经》中,利和贞是一对对立的范畴。用现在的话来说,利就是经济,贞就是政治。在管仲的思想中,仓廩者、衣食者、利也、经济也;礼节者、荣辱者,贞也、政也。管仲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正确观点,正是《易经》利贞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并出,人各言殊,各派根据各国诸侯的政治需要,发挥自己的一孔之见。他们把从《易经》中吸取的营养,说成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现在来争论《易经》思想是道家,还是儒家,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已!而阴阳学说竟被说成是邹衍一派的一家之言。历史的误会,实在莫过于此者。幸运的是经过“稷下先生”们的集体创作,给我们留下了《易经》和《管子》这两部伟大而辉煌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突破了各家各派的门户之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求实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应该说

是齐学成功之处。也是齐学之所以历久而不衰的奥秘之所在。

三、齐文化的现代意义

从严格科学意义上讲,齐文化与齐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其内涵大致相同,习惯上常常混同。我写“齐学三题”,也是把它们作为同一个词使用的。

司马迁写《史记·世家》中与齐学有关的有三篇:齐太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这三篇世家记述自齐太公立国,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大约一千年历史,标志着齐学、齐文化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网络形成,齐学、齐文化不再独立存在。然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并未泯灭,它仍然或隐或现地延续着。我在“齐学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曾就此做过探索。

齐学、齐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它的意义如何?这个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来加以研究。

首先,从政治上看,以百家争鸣为特征的稷下学风,是齐学、齐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它成为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双百方针的重要来源。稷下学宫出现在田齐时代,争鸣的风气可以追溯到姜齐。例如著名的齐鲁夹谷之会上,晏婴与孔丘就进行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已故的赵守正教授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全国第一次管子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讨论过齐学、齐文化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正是百家争鸣的稷下学风得以出现与维护发扬的关键。由于这种开放性,紧接着就派生出齐学、齐文化另一特色:多样性。众所周知:鲁文化是以孔丘、孟轲之学为中心的儒家文化,楚文化是以老聃、屈原之学为中心的道家文化,三晋文化是以李悝、商鞅、韩非之学为中心的法家文化。齐文化算是哪一家呢?翻翻最近几年《管子学刊》刊出的篇目,真

是百花争艳,美不胜收。这正是齐文化多样性的表现。然而,这种多样性决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杂货摊”。由于开放性、多样性,又引申出齐文化另一个特色:包容性,或者叫做综合性。多数学者公认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书,就是以管仲思想为核心,包容、综合了道、法、儒、名、阴阳诸家思想的一个典型。《易经》的最后编写也在稷下(详见《古易新编》),也反映了《管子》书同样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写了《从帛书易经与今本比较看儒道两家对《易经》思想的影响》。弄清楚齐文化开放性、多样性、综合性,这三种特点,自然就可以体会到它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多么重要了。与齐学、齐文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易经》和《管子》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思想宝库。考察齐学、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结其中的经济教训和基本规律,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常重要,必不可少。

在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为什么只有齐国,而不是其它地方出现稷下学风呢?毛泽东同志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以百家争鸣为特征的稷下学风,完全可以从当时齐国的经济基础中找到根源。据《史记》记载:“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兴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富,禄贤能,齐人皆悦。”至汉初,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於长安。”可以想见,当时的齐地,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这就是学术上百家争鸣所赖以出现的经济基础;而这在小农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今天可以从《管子》中看到的关于“轻重”和“侈靡”的两大经济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不无启发。我在十年前说过:“轻重理论是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利用价值规律的学说,从《管子·轻重》篇,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到当前我国现实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见《管子研究》第一辑 63 页、本书 47 页)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加深了我的这个认识;同时使我想起陈逸光教授也是在十年前曾经提出:轻重理论是封建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理论,我们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并未引起人们应有注意,从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侈靡》篇的基本观点,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说,就是“以消费促生产”。郭沫若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这块中国古代经济学说“化石”,并著文宣扬(见《奴隶制时代》148—201 页),同样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为什么?行文至此,不禁使我想起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话:“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起,忘记了。”这是半个世纪以前讲的,至今在我们的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中间,还有些人热衷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这样、那样的学说,对自己祖宗留下的优秀遗产,却毫不感兴趣。

最近,我从《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中,读到一篇题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的文章,深受启发。文中介绍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彭大成教授提出的湖湘文化的五个内容和特点及其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和它在四个方面的作用。我以为对齐文化(以及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其他文化)都应该进行同样的研究。谁能够说,稷下学宫兴起的“百家争鸣”,不是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源头呢?可惜的是在《管子学刊》上很少看到这样的研究。

一九九七年八月

管子学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想分四个问题来论述：一、《管子》是怎样的一部书？二、《管子》研究的历史意义。三、《管子》研究的现实意义。四、怎样开展管子学的研究。

一、管子书主要是一部经济学著作

现存管子书七十六篇，(另十篇有目无书)主要内容是讲经济问题的大约占三分之一多一些。其他有论道(哲学)的、论法的、讲历史的(如《三匡》等)，还有几篇杂著。在这些篇章中，不少也涉及一些经济问题。

胡寄窗先生《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后一章，谈到“重要经济概念的演变”时，列了九个题目，有六个提到《管子》。没有提到管子书的三个题目：重本轻末、土地思想、财政思想，不是管子书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胡先生没有提到。可以说，几乎先秦和西汉曾经出现的经济问题，经济观点，都可以在管子书中找到。在这里，我们只要集中搜罗一下胡先生关于管子书的论述，就足以说明管子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

“价格理论到《管子》作者手中更有较细致的论述，对价格动态和国内外价格政策的运用等方面却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轻重理论是我国古代最独特的经济理论，具有极丰富的内容。它虽以《管子》的阐述最详……到鸦片战争前为止，提到轻重之说的思想家很多很多，而绝大部分仅限于谈货币的轻重问题。即以货币的轻重问题来说，也少有人能达到《管子》已达到的分析水平。……这一理论未被全部继承与发扬，是我国经济思想史上一大遗憾。”

“《管子》肯定劳动是财富产生的根源。”

“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以财利为伦理规范基础的墨家观点，《管子》中这一观点更发展到古代的最高峰。”

“《管子》主张统治要能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实现‘贫富有度’。……《管子》主张通过经济措施特别是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短贫富分配不匀的差距；还指出了一些造成分配不匀的原因，尽管所举原因不一定正确，却是先秦各家所不曾提到的。”

“管子与桑弘羊处在战国、秦、汉时代，他们的侈靡消费观只能是反映古老的资本存在形态——商人资本化和当时小手工业者的观点。”

“《管子》中的货币思想极为丰富，标志着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成为封建地主经济全盛时期经常引证的货币理论根据。《管子》的轻重理论在货币问题上得到极充分的运用。……轻重理论与货币数量说二者的结合运用是其货币理论的核心。”

我们很赞成胡寄窗先生这些评价，只是觉得我们对管子书发掘得还远远不够，管子书还有潜力可挖。如果我们对《管子》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自然会对管子书作出新的评价。

二、研究管子书的历史意义

中国人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历代封建士大夫中许多人一直以“言利”为耻，注意经济问题、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很少。《管子》在先秦诸子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研究了经济问题，提出了不少可以称之为经济理论（虽然是朴素的）的东西。历代有头脑的政治家，例如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无不重视对管子书的研究。管子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包括从管仲（例如《牧民》、《山高》诸篇），到新莽时期（例如《幼官》及《轻重》中的某些篇章）大约数百年的历史材料和这个时期各种经济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弄通《管子》，就无法搞清楚从春秋到西汉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史。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动的重要时期。对这次大变动的性质、意义，历史学家们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傅筑夫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一书对此提出了新的观点。《管子》一书产生于这一大变动时期为地主制经济确立的时期，它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关于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停滞这个讨论了多年的老问题,应该有一个新的提法。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主要是明、清两代的事。在此以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未停滞,而且也不算慢。恰恰相反,在整整一千六、七百年的长时期内走在世界前列,比起西欧遥遥领先。虽然都是封建制度,地主经济较之领主经济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认真研究《管子》会使我们对于封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及其历史局限,获得深刻的认识。

我们习惯上总是把两宋看成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最近出版的申璋《简明科学技术史话》有一个新的看法很值得注意。这本书作了这样的描绘:“如果说唐朝象夏天中午十二点钟的太阳,那么宋朝就象午后两三点钟的太阳,虽然有点西斜,但是由于热量积累的缘故,这时地面气温却是最高。在汉唐农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的经济最繁荣。宋朝不断解除限制工商业发展的一些禁令,一般物品只要上税就可以生产和买卖,因此工商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以前不准私人冶铁,宋朝允许了。北宋时全国铁课年额最高是八百万斤,大约是唐朝铁课年额的四倍;钢课年额一千四百万斤,大约是唐朝的廿二倍。宋朝的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在苏州、杭州、成都的三大官办的锦织院中雇用工人都在几千人以上。北宋首都开封,参加行会的店铺有六千四百家,南宋末年杭州的人口远远超过开封。航海和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南宋时外国人来华贸易者达五十余国,我国商人出海到达的也有二十多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在宋朝取得的。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坐标的《梦溪笔谈》也出现在宋朝。”

要弄清楚元代以前中国社会为什么进步?明清两代为什么落后?《管子》一书非研究不可。

三、研究管子书的现实意义

春秋、战国以至西汉时期,我国商品经济曾经有相当大的发展。这一经济发展是轻重理论产生的基础。象在中医中药方面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成就一样,我国传统农业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经验。中国的经济学也有自己一套。

和马克思《资本论》比较,《管子》的经济学自然显得很落后,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不发达,到处是小生产的中国,作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学宝库的管子书,可能比《资本论》还要接近一些。目前我国农业正经历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伟大转变,认真地运用《资本论》的观点,批判地研究管子思想,同批判地吸取西方经验,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义”。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不正是可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吗?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十年动乱”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完全证明了这一真理。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导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所好恶。”这里说明为上者之重要,也就是说明领袖的重要。

这是《管子》第一篇《牧民》中阐述的三个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把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说明我们把管子书称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符合实际的。稍一接触现实,你就会感觉到这些观点现在也还有着多么巨大的活力。

为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研究我们民族的优秀遗产。“学习我们的民族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过去搞民主革命,武装斗争是这样,现在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应当是这样。

四、管子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要承认《管子》是一门学问,需要给予专门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其次,要想弄通管子,必须对它进行逐篇地研究。因为它不是一人一时之